

曲阜文史



政协曲阜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

曲阜文史

目 录 1982年8月第一辑

迅速抢救我县近代史、现代史和革命史资料·····	班守正	1
曲阜的历史沿革·····	骆承烈	5
曲阜历代的城址·····	郭克煜	8
古鲁国简史·····	秦 群	12
少昊陵与寿陵·····	卢兼三 孔令河	20
周荣鑫同志转达周总理关于保护“三孔”指示的经过·····	狄升彦	21
一九五九年郭沫若同志来曲纪实·····	高光明 孔繁银	23
孔德懋回故里探亲访友·····	祥民整理并摄影	27
孔庙修建述略·····	乐 山	30
孔林的建置与增扩·····	岳宗敏 杨影明	37
衍圣公与衍圣公府·····	管象敏 孔祥林	41
三十多年来的“三孔”保护·····	孔祥民	52
资料·孔子姓名的由来·····		58
照片·曲阜风采四幅·····	孔祥民摄影	封三
书法作品·郭沫若同志游曲阜诗三首·····	蒋丙彦 王增祥 陈寿章书	
本期篆刻·····	孔祥民	
尾花·孔庙珍藏汉画像石刻		

曲阜文史

目 录 1982年8月第一辑

迅速抢救我县近代史、现代史和革命史资料·····	班守正	1
曲阜的历史沿革·····	骆承烈	5
曲阜历代的城址·····	郭克煜	8
古鲁国简史·····	秦 群	12
少昊陵与寿陵·····	卢兼三 孔令河	20
周荣鑫同志转达周总理关于保护“三孔”指示的经过·····	狄升彦	21
一九五九年郭沫若同志来曲纪实·····	高光明 孔繁银	23
孔德懋回故里探亲访友·····	祥民整理并摄影	27
孔庙修建述略·····	乐 山	30
孔林的建置与增扩·····	岳宗敏 杨影明	37
衍圣公与衍圣公府·····	管象敏 孔祥林	41
三十多年来的“三孔”保护·····	孔祥民	52
资料·孔子姓名的由来·····		58
照片·曲阜风采四幅·····	孔祥民摄影	封三
书法作品·郭沫若同志游曲阜诗三首·····	蒋维宁 王树翰 徐寿康书	
本期篆刻·····	孔祥民	
尾花·孔庙珍藏汉画像石刻		

迅速抢救我县近代史

现代史和革命史资料

班 守 正

《曲阜文史》，和大家见面了。借此机会，我代表政协曲阜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，说几句见面的话。

文史资料工作，是周总理早在五十年代大力倡导的，是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，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内容。在新的历史时期，更有其承前启后、为四化建设服务的新的意义。文史资料，对向人民群众、特别是向广大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，增长知识，提高文化水平，对党的统一战线工作，对历史研究都将发挥重要作用。编好我县文史资料，对系统地介绍历史文化名城，促进旅游事业的发展会有很大好处，也是大家的要求。因此，要以强烈的事业心和历史责任感，认真做好这项工作。

曲阜，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化发祥地之一。县内有十几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。古传说和史书记载，神农、黄帝、少昊、商先王都曾以这一区域为活动中心，古史称“少昊之墟”，古鲁国的国都。著名古代思想家、教育家、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故乡。两千多年来，孔子嫡派后裔一直聚居在这里。因此，曲阜地上地下，保存了大量文物古迹。近代，特别是现代以来，曲阜反帝反封建的斗争，此起彼伏；

解放前省立曲阜二师（现为曲阜师范学校），是中共曲阜党组

建立和发展的早期活动基地；与此同时，国民党组织在曲阜也一直加剧扩张，肆虐抗衡；抗日战争期间，日伪猖獗，敌我斗争十分复杂；金融、物价，时涨时落；文化教育，时进时停；一九四六至一九四八年，曲阜先后两次解放，东部曲、泗两县交界一带，为先期解放的老区，而西临津浦铁路和敌伪顽守的兖州相毗邻，曲阜则处于“拉锯”区域；在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中，曲阜人民昼夜碾军粮，做军鞋，组织担架，奋起支前，做出巨大贡献……史实一再证明，曲阜在古今历史上的特殊地位，造成了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教育、卫生、科技、民族民俗，宗教帮会，名胜古迹以及各色人物等等史料的多面性和丰富性，这是一笔极其珍贵的历史财富，应该深入发掘，广征博采，辑录成册，使其发挥应有作用。同时，《续修曲阜县志》年代断至一九三四年，做好这一工作，也将为编修县志提供应有的资料。

但是，还必须看到，我县近、现代史、革命史的亲历老、知情者，有的年事已高，有的已病老去世，就史料来说，这些老人“生则存，死则亡”。因此，应该迅速行动起来，发掘和抢救我县近代史、现代史和革命史资料，这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，刻不容缓的历史使命。

我县文史资料工作，在县委领导重视和各有关单位大力支持下，一年多来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，自去年六月成立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以来，进行了大量工作，已征集各类史料四十多篇，三十多万字，史料图片二百多幅。此外，还查到了国民党在曲阜的组织状况、曲阜两次解放等重大史料的采写线索，为下步工作的深入开展创造了条件。

为满足各方面的需求，特别是自国务院公布我县为历史文化名城以来，各系统、各单位、各人民团体的领导和同志，亟待深入地、较系统地了解曲阜的历史，为此，经政协五届三次全委会讨论，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研究，决定编印《曲阜文史》。现就有关问题作如下说明：

第一，《曲阜文史》，是政协曲阜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的内部资料，不对外发售，只供内部参阅；

第二，《曲阜文史》，按专题、不定期编印，每辑主要编一个专题，页码、文字有所机动。今年争取编印四辑；

第三，文史资料工作的根本任务，是发掘和抢救亲历者、知情者所掌握的、没有记载或记载不详的活的历史资料。但是，考虑到读者，有关的专门工作者，研究者对我县史料的需求，在征编过程中，从散存于各有关档案中辑录了部分资料，撰写成章，陆续编发，为参阅提供方便；

第四，在征集史料和编印《曲阜文史》中，始终坚持“存真求实，实事求是”，“秉笔直书，多说并存”、“广征博采，抓住重点”，“史重于文，史文并茂”和“有闻必录，文责自负”等一系列重要原则。

殷切期望广大读者，各界人士，踊跃撰稿，或提供史料查询线索，并对我县文史资料工作提出宝贵意见、批评和建议，共同把这一工作做好，使其有效地为建设两个文明服务，为历史文化名城增添异采。

在《曲阜文史》和大家见面之际，对给予很大支持和帮助的各有关单位致以深切谢意！

曲阜的历史沿革

骆承烈

曲阜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、教育家、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故乡。位于山东省东南部，京沪铁路东侧。地处山东丘陵西部和鲁西平原东部的边缘上。县境东邻泗水县，北靠宁阳县，西接历史上著名的战略要地兖州县，南连我国古代另一思想家孟子的故乡邹县。它不仅以孔孟桑梓之邦、邹鲁“圣地”著称于世，同时也是一座闻名中外的历史文化名城。

“曲阜”一名，最早见于《尔雅》之注。《尔雅》是一部假托周公或孔子所作、实则西汉时人的作品。上记“大陆曰阜”。东汉应劭注：“曲阜在鲁城中，委曲长七、八里，故名曲阜。”此说与今曲阜城东防山一带的丘陵地段想应。关于此地隶属的较早记载，首推《尚书·禹贡》。上记“海岱及淮惟徐州。”指此处应归“禹贡九州”中的徐州所属。《左传》载“鲁有大庭之庠”，唐人孔颖达释：“大庭氏古天子之门。鲁城内有大庭氏之虚，于其上作庠”。《史记》又记“神农氏都陈，迁于曲阜”。《帝王世纪》载：“黄帝生于寿邱”（《曲阜县志》释“寿邱在鲁东门之北”），“少昊自穷桑登帝位，徙都曲阜，崩葬云阳山”等等。上述记载，多为古人假托或传闻，无从考稽，但其中有关少昊的记载，却应有些道理。按原始社会时，山东属于东夷族活动的范围，少昊即东夷族首领之一。当时尚无阶级、国家，无所谓帝王，“少昊金天氏”、“以金德王”之说皆系假托。少昊可能是人名，也可能是一个族名。近年来在山东中部的汶、泗、沂、濰河流域及泰山周围发现的大汶口文化，是用科学考古学的方法发现和认定的一种我国东部的文化，它应与东夷族（或者说少昊族）有很大的关系。

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记“鲁有古奄国”。清修《网里文献考》等书均记曲阜“在殷为奄”。奄是商的属国，是我国古代与中原华夏族犬牙交错的一个东方部族。汤灭夏建国后，在黄河流域活动。其后经过十几代，商王南庚时由邢（河南温县东）迁到奄，此后盘庚又由奄迁到殷（河南安阳西北），至此定居下来，开始了具有灿烂文化的晚商的历史。在此前后，曾经六迁，致使“荡析离居，罔有定极”^①，给人民带来很大的困难。这固然由于统治阶级内争所致，也是自然灾害所造成的。可知当时此处尚开发不足，生产水平有限。

公元前十一世纪，周武王伐纣灭商。周王建都镐京后，为了建立和巩固奴隶制国家的统治，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政治大分封。奄为商人故地，反周势力雄厚，斗争形势复杂，位置分外重要，因此周武王将其胞弟、王国辅臣周公封到这里。周公旦因辅佐天子，不能离镐东

行，遂令其长子伯禽赴鲁就国。元时立《历代沿革志碑》载：“周兴，以少昊之虚封周公子伯禽为鲁侯。”乾隆版《曲阜县志》记：“今县城及郡之东南，皆鲁城故地也。”记下了周代鲁城的大致方位。但具体范围却不详。据近年来考古钻探表明：周代鲁城呈扁长方形，城的周围长23.7公里，面积39.5平方公里。东西约3.5公里，南北约2.5公里，四角呈弧形，城墙四周呈曲线，以北墙最甚。此城比现存之明城大四、五倍。现东西墙有些部份已无遗迹，其余部份则断垣绵延如龙，依稀可见。

至于周鲁城残壁，是何时修筑的？说法历来不一：《史记·周本纪》载：“武王封弟周公旦于曲阜，曰鲁”。笼统地说周公旦在鲁地建都。而早于《史记》的《左传》却说：“昔武王克商，成王定之。选建明德，以藩屏周”、“分鲁以大路之康……因商奄之民，命以伯禽，而封于少昊之虚。”是说最早来曲阜的是伯禽。《括地志》记：“兖州曲阜县外城，即鲁公伯禽所筑也”。肯定是伯禽筑城。而《史记·鲁周公世家》当记到鲁国第三个国君、伯禽之次子炀公（熙）的事迹时，又记“炀公筑茅闾门”。《集解》引徐广语“《世本》曰：炀公徙鲁”。则又是炀公时筑的鲁城，建的“茅闾门”了。两者孰是孰非？有人考证以炀公为是。^④

关于周鲁城的情况，一些记载各有详略，至《太平寰宇记》则记之颇详。周鲁城共有十二门：正南门曰轂门，南左曰戟门，右曰雩门，正北曰圭门，北左曰齐门，北右曰龙门；正东曰建春门，东左曰始明门，又曰上东门，东右曰鹿门，正西曰史门（亦作吏门），西右曰友门，西左曰归德门。据目前勘测结果来看，与记载大体相符。从普查探测得知：古鲁城城高墙宽，街道开阔规整，宫阙区、居民区整齐划一，制铜、冶铁、制骨、制陶等手工业门类齐全。今周公庙附近即古城中的宫阙区，规模宏大，建筑水平甚高（已发现一些柱础、石基、铜器、陶器等）。可知当年的古鲁国已相当繁荣。

自公元前十一世纪鲁建国，历三十四个国君，经八、九百年，至公元前249年（鲁顷公二十四年，楚考烈王十四年，秦庄襄王元年）被楚所灭，此地改为鲁县。公元前223年（秦王政二十四年，楚王负刍五年）秦灭楚后，复为秦之鲁县。秦统一六国后，实行郡县制，以鲁县隶属薛郡，郡治即设在曲阜。楚汉战争之初，楚怀王心将项羽封为鲁王，此地为项羽势力所及。汉高祖五年（公元前202年）冬“汉兵围项籍（羽）於垓下，籍自杀，楚地悉定。独鲁不下。王欲屠之，至城下，犹闻弦诵之声。谓其守义之国，为主死节。因持箭头示之，鲁乃降汉，以鲁公礼葬於谷城。”有的书上还记载：“曲阜城东东汉下村有古墓，俗呼‘霸王头’，相传为葬羽首处云。”当地更说城东古城村旁一、二大冢为霸王墓。笔者1958年参加的考古发掘证为汉墓，但与霸王无关。

西汉建立后，继续实行秦时的郡县制，但刘邦为了屏卫王室，也曾将少量同姓子侄封于各地，此地亦如此。先是在高祖武德七年（公元前200年）此地仍名鲁国，治属豫州郡（郡治在河南），下属六个县：鲁、卞、汶阳、蕃、邠、薛。至吕后元年（公元前187年）封张耳之后张敖为鲁元王，改鲁县为鲁国，属徐州。后因张敖获罪废为侯，鲁国亦废除。景帝三年（公元前154年）又将淮阳王刘余徙封于此地，为鲁恭（共）王，仍号鲁国，隶徐州（郡治在江苏），下仍辖六县。鲁恭王骄奢淫逸，好治宫室，曾毁孔子旧宅之墙（鲁壁）得古文经，又作当时极为豪华的灵光殿。^⑤后经王莽之乱，此国亦废，而灵光殿则岿然独存。

古书记载未将周鲁城与汉鲁城分开，只记汉代的灵光殿在鲁城之内，可知两者相距不

远。经初步考古探测：在周鲁故城内发现一座小城遗址。城呈长方形，南北长1.3公里，东西长2.5公里，已发现五个城门。此城在地面上已无痕迹可寻。

东汉初年，光武帝刘秀将此地改属任城郡。建武十九年（公元43年）将废太子刘弘东海王，令其利用光殿之遗存，仍都于鲁。后又属豫州。以鲁县为东海国治。

魏晋时期，将鲁国废除，改为鲁郡。郡治设在曲阜。刘宋时将鲁郡郡治徙於邹县，此地名鲁县，为其属邑。北齐时改鲁为任城郡。隋文帝开皇二年（公元583年）废任城郡，使其隶属于兖州。次年改县名汶阳。开皇十六年（公元596年）“初定县名曲阜”，自此开始出现曲阜之名。隋炀帝大业三年（公元607年）又改兖州为鲁郡，隶徐州，下属四县。唐太宗贞观八年（公元634年）曲阜仍属兖州，鲁郡隶属于河南道。五代后周太祖广顺二年（公元952年）改秦宁军为防御州，曲阜县为其所属。北宋太祖建隆元年（公元960年）又复兖州为节度，曲阜县仍隶属兖州。宋真宗即位后，即来曲阜朝圣，对孔子倍极尊崇，对此地倍加重视。大中祥符五年（公元1012年）闰十月“帝言轩辕皇帝降於延恩殿。逾群臣曰……赵之始祖再降乃轩辕黄帝。黄帝生寿邱，寿邱在曲阜。乃改曲阜为仙源，徙治寿邱。”於是便在周、汉鲁城之东建一新城，名仙源县。接着，又“作景灵宫、太极观於寿邱。”后加封孔子为“至圣文宣王。”宋仙源县即今曲阜城东六、七里的旧县村，村北有少昊陵。今此村仍有当年的石桥、河流等遗迹。宋徽宗重和元年（公元1118年）七月，升兖州为蔡庆府，仙源县归其隶属。金太宗天会七年（公元1129年）又复仙源县为曲阜县。金世宗大定十九年（公元1179年）改蔡庆府为兖州蔡定军节度使，隶於山东西路，曲阜县归其所属。金宣宗元光年间一度改为仙源县，不久又恢复曲阜之名。元世祖至元十六年（公元1279年）秋，改蔡定军为兖州，隶属山东东西道济宁路总管府，曲阜县仍属兖州。明太祖洪武十八年（公元1385年）升兖州为府，隶山东布政使司，曲阜属兖州府。明武宗正德六年（公元1511年）刘六、刘七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曾一度攻下阙里，大大震动了曲阜的封建统治者。于是东兖道金事潘珍便从卫护孔庙的目的出发，上疏筑城，很快得到允准。从正德七年（公元1512年）至嘉靖元年（公元1522年）历十一年之功，花了三十五万八千两银子，在古鲁城的西南角新修成曲阜城，将孔庙、衍圣公府纳入城内。今存即明城。城有五门：东名乘礼门，西名宗鲁门，北名延圣门，南为仰圣门。但此南门正对孔庙大门，为对孔子尊崇，此门一般不用，在其东面另辟一门，名崇信门，俗称东南门。至清以来，曲阜之名沿袭未改。

注

①《尚书·盘庚下》

②《左传》宣公四年

③茅即夷字，意为平东方夷人后所建之门。

④《鲁国建都曲阜问题》（载《咸与立》1978年第六期）

⑤乾隆版《曲阜县志》卷四十九《古迹》部份转引。

⑥《曲阜县志》卷十八《通编》

⑦《阙里文献考》卷二十九《城邑山川》

⑧东汉人王延寿曾作《灵光殿赋》，载于《阙里文献考》等书。

⑨《曲阜县志》卷二十一《通编》

⑩《曲阜县志》卷二十四《通编》

曲阜历代的城址

郭克煜

曲阜历史悠久，文物古迹众多，仅古城址就有好多处。

鲁国建国前的古城址

对于鲁国建国前曲阜的历史，历来有许多传说，曾为“少昊之墟”，又为“大庭氏之国”所在地，还有“神农都陈，徙都曲阜”等。

这些古代传说是否可靠，很难考证。但是近些年来，在曲阜一带已发现多处大汶口文化遗址与龙山文化遗址，这些遗址表明，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，这里已有人类定居。

由于资料缺乏，目前尚不能肯定当时的人们，是否已经在这里筑有城郭，不过，当历史发展到殷商时代，这里已有城郭出现，则是可以肯定的。据今本《竹书纪年》载：

“南庚名更，元年丙辰，王即位，居庇。三年，迁于奄。”

“阳甲名和，元年壬戌，王即位于奄。”

“盘庚名旬，元年丙寅，王即位故奄。”“十四年，自奄迁于北蒙，曰展。”

在甲骨文中，也曾多次出现奄这个地名。例如：“王入于奄”（《殷墟文字》页九）；“贞，今如奄”（《铁云藏龟》页一七九），等等。

经专家考定，奄即今曲阜。商代既曾在此建都，当然也会在这里修城建郭，因为商代已进入奴隶制社会；在阶级对立的情况下，奴隶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地位，并防御外敌入侵，筑城自卫，当是十分自然的事情。

商王迁殷之后，这里为奄国国都。据《韩非子·说林上》载：“周公旦已胜殷，将攻商盖。辛公甲曰：‘大难攻，小易服，不如服众小以劫大’。乃攻九夷，而商盖服矣。”商盖即商奄，商盖既为难攻的大国，证明了当年的商盖，是在此筑有城郭的。

商、奄时代曲阜古城的位置及其规模，目前因资料缺乏，尚无从考察。前些年，考古工作人员对曲阜古城址进行了初步的普查。从普查情况来看，古鲁城的位置及其规模已经比较清楚，但对古鲁城以前的奄国城址，却未发现任何资料。

古鲁城城址

古鲁城是指周灭商以后封周公于鲁以后所建的鲁城。关于古鲁城的情况，文献中有不少记载，今摘录几处如下：

《太平寰宇记》：“古鲁城，春秋之时鲁国都也。其城凡十有二门。”

元杨奂《东游记》：“鲁门十有二，正南曰稷，左曰章，右曰郛；正北曰圭，左曰齐，右曰龙；正东曰建春，左曰始明，右曰鹿；正西曰史，右曰麦，归德其左也。当时天下学者由是门入，故鲁人以此名之”。

顾祖禹《读史方輿纪要》：“其城，凡十二门，……自春秋至战国，鲁世都之。……《志》云：‘今县城及郭外之东南，皆鲁城故址也’。”

乾隆版《曲阜县志》：“鲁城旧址，东南犹逶迤相属，东北城隅有五泉，今所称洙水之白出也。循洙而西望，至圣林门在城上，由林西村绕洙南行，接今县城，犹隐隐有数段可寻。古鲁城约周三十余里。”

考古工作者的普查证明，文献中有关古鲁城的记载，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。但也有不相一致的地方，例如：文献中记载鲁城有十二门，普查中只发现十一门，尚有一门没有查到；文献说，鲁城周围约三十华里，但实地丈量仅为二十四华里。另外，经过普查，还获得了一些文献中所未载的资料。比如：在古鲁城内，发现了多处手工业作坊遗址，其中有制铜、制骨、冶铁、制陶等作坊遗址。当时的墓葬区也发现多处，像今苗圃一带、孔林前、伯禽台一带、万古长春坊附近、林前村以南等地方，都有当时的墓葬发现，并作了部分发掘。

必须指出，这次普查，仅是初步考察，要较为全面地了解古鲁城的真实情况，仍需继续发掘探索。举例来说，文献资料记载，东门襄仲，居住于古鲁城建春门南；季氏之宫，亦在今城之东。对于这一带地区，至今还没有作过较为深入的调查。

根据考古普查与文献资料，对于当年的古鲁城，可以提出如下几点看法：

其一，当年的鲁城，与后世曲阜的几个城址相较，面积最大。鲁国之所以要修建面积这样大的都城，乃是因为当时正处于社会动乱、诸侯割据的阶段，春秋时则有大国争霸，战国时则有各国兼并，战争连绵，少有间歇。鲁国介乎齐、楚之间，直接受到强国的争夺，尤须加强防卫以自保。扩大城郭的修建，无疑是加强防卫的有力措施之一。这样，在城中不仅可以建筑宫殿，可以安排居民住所，而且可以设立各种手工业作坊及公共活动场所，直到安排墓区埋葬死者；周围又有大片的土地，可以供从事农业生产之用。从而当敌人攻城时，才能够防守一个相当长的时间，不致在短时间内为敌人所攻破。

其二，古鲁城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。城南有小沂水，城北有泗水，而在城北和城西，当年还有洙水流过。在平原地带没有山峰可作屏障的情况下，除了人工修筑城郭可以保卫自己免受敌人攻击外，这些自然河流，也成为阻止敌人进攻的天然防御工事。《春秋》庄公九年：“冬，浚洙”。杜预注：“浚深之，为齐备”。这是说，通过疏通和加深洙水水道，来加强对齐国入侵的防御。由此可以看出，鲁人把城址选在这里，事先是曾经一番考虑的。

其三，古鲁城所以有十二个城门，是为了满足方便交通的要求。由于当时交通工具落后，除贵族可以用车与马作为交通工具外，一般人只能依靠步行。而鲁城城郭面积宽广，为了出

入方便，势必要多开几座城门；这样，居住于城中的居民，通过十二个城门，可以通往四面八方，不致有交通不便之感。

汉至宋初的城址

自汉至宋大中祥符以前的曲阜城址，与古鲁城差别较大。从文献资料来看，这一时期的城址，面积较古鲁城为小，约位于古鲁城的东北隅，今古城村一带。

又《太平寰宇记》：“阙里在曲阜县西南三里”；“孔林在县西北六里”。是书成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，时在真宗大中祥符以前，所记阙里及孔林的位置，都可进一步证明汉、唐故城确在古鲁城东北隅。同时也说明，北宋初年，大中祥符之前，曲阜县城尚在汉、唐旧址，否则所记阙里及孔林位置便不符合实际了。

据初步调查，汉、唐曲阜故城的东、北两面，大约与古鲁城大体重合，但西面与南面，均较古鲁城为小，那时城址之所以会缩小，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已进入政权统一的时代，没有必要再修建象古鲁城那样大的防御性城郭了。

今县城东北古城村一带，还明显地残存着古城址的迹象。在这里，汉代瓦片，比比皆是，即是证明。

宋大中祥符至明嘉靖以前的城址

曲阜古城址，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又发生过一次变动。《阙里文献考》载：“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（公元1012年），以轩辕黄帝降于延恩殿，……乃于曲阜作景灵宫以奉之，改县名为仙源县。”《续修曲阜县志》指出：“大中祥符五年，改曲阜为仙源县，徙治于寿邱，即今城东旧县。”

元立《曲阜县历代沿革志》碑载：“真宗祥符五年，以曲阜有寿邱之故，改曲阜县为仙源县。金天会六年十二月陷庆府，明年秋，仙源复曲阜旧名。……金宣宗元光二年，徙都汴，明年，义宗即位，改元正大。时李全据山东州郡，以附南宋，改曲阜为仙源；未几，复改曲阜。”

宋真宗自称黄帝后裔，为追寻黄帝发祥之地，于曲阜寿邱建新城（相传“黄帝生于寿邱”），而旧城因此而废。虽然宋真宗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把自己打扮成真龙天子，以维护封建统治，但这一城址却一直延续到明嘉靖年间。新城位于今县城东之旧县村，遗迹已荡然无存。估计当时并未修建城池，费宏《城阙里记》说：“阙里与曲阜相去十里，故皆无城，而阙里尤为孤旷，守望无所恃焉。”这话正反映了新城规制未宏、而旧城却已萧条的历史事实。

明嘉靖以后的曲阜城

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曲阜城，乃是明嘉靖初年所建。关于建筑此城的原因，费宏《城阙里记》有如下的记载：

“正德辛未，盗入兗，以二月二十七日破曲阜，焚官寺民居数百……是夕移营

犯阙里，秣马于庭，污书于池，虽庙宇林墓幸而无虞，然族属散走，神人震。爰乎危亦甚矣……维时令按察使潘君珍方以金事按行东兖，谓县庙必相须以守，即庙为城，而移县附之……遂疏于朝……群臣既恰，诏从之……纪始于癸酉之秋，月，迄工于嘉靖壬午之春三月。”

引文中的“盗”，系指明正德年间，由刘六、刘七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。由于起义军攻入孔庙，“秣马于庭，污书于池”，故明统治者把曲阜县治从宋所建新城迁回，并筑城卫庙。这就是今县城的由来。

关于当时所筑城池的规模，《阙里文献考》有如下记载：

“城周八里三十六步，高二丈，厚半之，池深一丈，广称之。凡五门，正南曰。仰圣门，东南曰崇信门，东曰秉礼门，西曰宗礼门，北曰延恩门。”

由于此城的建立完全是为了保卫孔庙，因而城的正南门便称为“仰圣门”，实际上，此门成了孔庙的南门。同时，由于孔庙前后九进院落组成一个南北长、东西宽的庞大建筑群，结果导致今城的西门和东门之间，没有一条直通的大道，给城内交通带来极大不便。

综上所述可知，曲阜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古城，除北宋所置仙源县以外，大致不出古鲁城范围。由于自上古以来，历代统治阶级不断在这里封邦建国，设郡置县，加之这里为鲁国的故都，历代尊孔典礼日益隆重，土木工程的建筑越来越大，遂使曲阜成为我国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之一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历代古城至今多未存留，现在地面上所能看到的，仅有古鲁城南墙的残存部份及明代故城的南、北门而已。从考古学的角度上来说，曲阜的历代城址遗迹正是古鲁国考古的重要内容；古城址的变迁，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我国古代历史的变迁，通过对古城址遗迹的考察，有助于我们对古代历史的深入探讨。

(上接19页)

三家均已封侯，不久分晋。齐国田氏也已代齐，田和此时已列为诸侯。至平公时，六国均已称王。到了顷公二年（公元前271年）秦已拔楚之郢都，楚顷襄王东迁到寿春。顷公十九年（公元前253年）楚伐鲁，取徐州，此时正当秦、赵两大强国在北方进行长平之战时，他们无暇东顾，致使楚国出兵无人阻挡。顷公二十四年（公元前249年，楚考烈三十三年，秦庄襄王元年）楚灭鲁，顷公迁居下邳，为家人。至此鲁祀绝。后“顷公卒于柯”（山东东阿）。

总之，鲁国立国八、九百年（《曲阜县志》记873年，系推算而来），历三十四君，最后亡于楚，并于秦。其立国时间虽不太长，但这一古国对我国古代社会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方面却有着重大的影响。

哀公	①	②	③	④	⑤	⑥	⑦	⑧	⑨
(将)	悼公	元公	穆公	共公	康公	景公	平公	文公	顷公
(共二十七年)	(宁)	(嘉)	(显)	(奋)	(屯)	(显)	(叔)	(贾)	(隰)
入战	三十七年	二十一年	三十三年	二十二年	九年	二十九年	二十年	二十三年	二十四年

古鲁国简史

秦 群

山东曲阜是春秋时的古鲁国故址，这里有着丰富的地下遗迹和遗物。“曲阜鲁国故城遗址”是1961年国务院颁布的第一批“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之一。我国奴隶社会以来著名的这一古都，不但与齐都临淄、赵都邯郸、秦都咸阳、楚都郢等地齐名，而且有其特点。它在西周时期既是大国，又特别受宠，奴隶制经济、政治、文化都相当发达，在奴隶制即将崩溃的春秋末年，不但出了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、教育家孔子，还出了能工巧匠鲁班，军事家曹刿、奴隶领袖“盗”跖等。熟悉古鲁国的历史，是了解我国奴隶制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。

立 国 前 后

一、立国之前：

古鲁国立国前的历史，尚无确切记载，只是一些古代传说。据近些年来，在曲阜城北的洙河两岸和城南的沂河两岸，陆续发现的几十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中，曾多次发掘出的大批磨制石器、骨、角、蚌器，灰、黑、白陶器等，可以推知这里在原始社会的生产水平是相当先进的。

古籍中有黄帝都寿邱、神农都曲阜及曲阜为“少昊之虚”等记载，虽尚无更多的材料证明，但关于少昊在曲阜活动的记载却相当不少。

古代传说中有太昊、少昊之说（昊同皐、皞，天也）。少昊传为“五帝”之一，“五帝”的主要说法有：

《礼·月令》太昊（伏羲）、炎帝（神农）、黄帝、少昊、颛顼；

《世本》、《大戴礼记》、《史记》：黄帝、颛顼、帝喾、帝尧、帝舜；

孔安国《尚书序》、皇甫谧《帝王世纪》：少昊、颛顼、帝喾、唐尧、虞舜。

上三说中，两种有少昊。而《左传》中又以少昊代黄帝，第二种说法中似乎也有了少昊。可知少昊应为古传说中的“五帝”之一。古籍中关于少昊的记载传说甚多，如《左传·昭公十七年》记：

“秋，郯子来朝，公与之宴。昭子问焉。曰‘少皞氏鸟名官，何故也？’郯子曰：‘吾祖也，我知之。昔者黄帝氏以云纪，故为云师而云名；炎帝氏以火纪，故以火师而火名；共工氏以水纪，故为水师而水名；太昊氏以龙纪，故为龙师而龙名。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，凤

鸟适至，故纪于鸟，为鸟师而鸟名。”鄒子接着一口气举出二十个鸟名，各有职守。一个鸟朝廷。正应着我国古代东南沿海以鸟为图腾之说。

《山海经·西次三经》记：“东海之外有大壑，少昊之国。少昊孺帝颙顼，于此弃其琴瑟。”是说少昊氏为其侄儿颙顼造了琴瑟。侄儿大了，将琴瑟抛进大海东方，传说直至若干年后，东海仍有琴瑟之声。同书还记少昊子名蓐收，居东海，专司观察太阳光反射的光辉是否正常等。

《拾遗记》载：“少昊以金德王，母曰皇娥，处璇宫（美玉修建的宫）而夜织，或乘桴水而昼游，经历穷桑苍茫之间。时有神童，容貌绝俗，称为白帝之子，与皇娥嬉戏。奏便娟之乐，游漾而归。帝子与皇娥于海上，以桂枝为表，结薰（香）茅为旗，刻玉为鸠，置于表端，今之相风……及皇娥生少昊，号曰穷桑氏，亦曰金天氏”。

近世以来，有人更把少昊的传说综合起来，写着：“少昊，古帝，亦作少皞。黄帝子，嫫祖所生，名挚。修太昊之法，故曰少昊。以金德王，故曰金天氏。邑于穷桑，又号穷桑氏。国于青阳，又号青阳氏。死葬云阳，又号云阳氏。都曲阜。在位八十四年”。

上述传说，仅供参考。但至少可以看到这样几点：第一，少昊是我国原始社会中东方的一个部族名或部族酋长名。后向西迁，与黄帝族联系起来。第二，少昊族以鸟名官，正符合我国古代东南沿海鸟图腾的传说。各种不同的鸟应是这个部落联盟中的不同胞族。第三，有的记少昊之父为“神童”，有的说“白帝之子”，有的说“大星如虹”，很抽象，而其母（皇娥）则很具体。这体现出“知母不知其父”的母系社会的特点。第四，少昊既非帝，又非王，至多不过是当时一个部落酋长。我们了解他，只是说明在远古时代的曲阜，就有人在从事活动。如果和近年发现的大汶口文化相印证，则更能说明问题。

夏活动于今河南的洛阳平原、山西汾水的中、下游一带，它和周围一些氏族处于犬牙交错的状态中。居于曲阜的奄，便是当时的一个氏族。

《尚书·盘庚》记商王盘庚由奄迁殷的情况，通篇记载了盘庚的权威，有人便认为由奄迁殷是当时当权的奴隶主制止奴隶主们骄奢淫逸，鼓励去新地艰苦创业。其实因当时粗耕的土地上，地力耗尽，迁殷另谋发展而为。当然并未全部迁走，还留下一部份。古鲁城内部古斗鸡台遗址发现的陶器与别处迥然不同，就是日后商人聚居的实证。

二、伯禽封鲁

古鲁国是我国发达的奴隶制社会——西周的一个重要封国。鲁，上为“鱼”，下为“日”。一说上为“鸟”，讹写为“鱼”。下之“日”有说是网（鱼入网内），有说是巢（鸟落巢中），有说是高地（鸟落到一片高地上）。后说与“委曲”、“高阜”意近，“鸟”说即鸟图腾，“鱼”说示东方鱼盐之利。《论语》中孔子说其弟子“参也鲁”，并不单指其笨、钝，而是称赞其质朴、实在之词，是一褒词。后人解释“质胜文”为鲁，是说质朴实在，不尚豪华之意。即使后世引申的“鲁莽”、“粗鲁”，也有强猛、直爽的意思在内。

公元前十一世纪，周武王继父业灭商。牧野之战，奴隶倒戈，周胜商。毛泽东同志说是“当时的人民战争”。武王建都镐京后，为了建立奴隶制统治，便以“天下共主”的名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大分封，受封的各类诸侯，爵位有高低，关系有亲有疏，疆土有大有小，军队有多有少。武王、成王先后分封了七十一个诸侯国。分封的特点有：第一，“授土授民”，让被封的奴隶主对土地和在地上耕作的奴隶实行合法占有。第二，天子之下的爵位分公、侯、伯、

子、男。诸侯国内有诸侯，卿、大夫、士等。规定严格的等级制。第三，周天子为天下土地、奴隶的共主，即“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”第四，实行嫡长子继承制的宗法制，大宗统治小宗，天子统治全国。在当时几个重要的封国中，鲁是最重要的一个。

商人故地奄，反周力量强，位置很重要，为了加强对这里的统治，武王便将其胞弟、王国的主要辅臣周公旦封于“少昊之墟”、故奄地，立国为鲁。周公因辅佐周王，不能离镐东行，遂令其长子伯禽赴鲁就国。《左传·定公四年》记封伯禽时，赐“殷民之族”：条氏、徐氏、肖氏、索氏（绳工）、长勺氏、尾勺氏（酒器工），即六种手工业奴隶。近年在兖州发现的一只商卣上有“~~荼~~父癸”（索册父癸）的铭文，似应指在“父癸”时，此人被“册”封为“索”族的首领。证明商时此地确有一个索氏族。

受封时，有丰富统治经验的周公特别嘱咐其子伯禽要“启以商政，疆以周索”，就是说推行政令时，要照顾到商人的习惯。但在划分土地这样的大事上，却要原则上按周制办事。因周公在周王室的功劳特高，权力特大，所以伯禽带到鲁的礼物最多，典籍也特别丰富。以致多年后晋国大夫韩宣子在鲁观《易象》及《春秋》后说“周礼尽在鲁矣！”吴国公子季札曾遍历北方的卫、郑、徐等国，到鲁“请观于周乐”，《左传·襄公二十九年》记当他在鲁国能听观周朝大濩的音乐及舞蹈后，边看边赞不绝口，最后竟发出“观止矣！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”的赞语。

《史记·鲁周公世家》记：“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，三年而后报政周公。周公曰：‘何迟也？’伯禽曰：‘变其俗，革其礼，丧三年然后除之，故迟’。太公亦封于齐，五月而后报政周公。周公曰：‘何疾也？’曰：‘吾简其君臣礼，从其俗为也。’及后闻伯禽报政迟，乃叹曰：‘呜呼！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。夫政不简不易，民不有近。平易近民，民必归之’”。

可知伯禽为了加强统治，到鲁地后，在统治术上下过很大的功夫，对原来固有的一套变动很大，即仿效周王室那样建立了标准的奴隶制统治。但这种统治术如果和齐国因地制宜的办法相较，则又稍逊一等。

周公旦的长子伯禽被封于鲁，其次子留相王室，代为“周公”。其余被封小国者六人：凡、蒋、邢、茅、胙、祭。

三、周公东征：

伯禽封鲁前，这里形势就很复杂，斗争异常激烈，周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所以对伯禽一再嘱咐要谨慎统治。《史记》记：“周公戒伯禽曰：‘我文王之子，武王之弟，成王之叔父，我于天下亦不贱矣。然我一沐三捉发，一饭三吐哺，起以待士，犹恐失天下之贤才。子之鲁，慎无以国骄人。’”周公谆谆告诫伯禽一定要礼贤下士，广泛搜罗奴隶主中的贤才，以统治好鲁国。周公庙正殿西侧有个金人，就是周公当年送给伯禽一个奴隶的形象。让金人经常背着伯禽，伯禽便可经常看到金人背上的铭文。上面写着：

“古之慎言人也。戒之哉！戒之哉！无多言，多言多败……执雌持下，人莫谮之……内藏我智，不示人技。我虽卑高，人弗我害，谁能于此。江海虽古，长于百川，以其卑也……”总之，是后发制人，深谋远虑，要伯禽在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下谨慎从事，重视自己的敌手，以建立姬姓统治的千秋基业。

鲁地斗争激烈，主要表现在武庚及“三监”反上。还是在武王灭纣后，就对殷商奴隶主集团分别对待，曾“释箕子之囚，封纣子武庚禄父，使管叔、蔡叔付之，以续殷祀”。就是

把纣子武庚封于商故地（奄），派文王的三个儿子（管叔、蔡叔、霍叔——史称“三监”）名为帮助他统治奄地，实为监视他。武庚就利用商故地的残余力量搞复辟活动。他针对周公当时“履天子之籍，听天下之断”，即掌握中央大权，管叔等嫉妒的时机，进行挑拨，于是武庚和“三监”还有徐、淮、蒲姑等少数族，甚至还有楚人（熊盈）一起举兵反周。其力量甚大，致使周统治者不得不发出“邦之安危，惟兹殷士”的呼声。面对这一严重形势，周公“内弭父兄，外抚诸侯”，立即组织大军，“奉成王命，兴师东征。”经过三年激烈的战争，终于平定了这场叛乱，并征服了参与叛乱的一些东方小国和部落，把周的统治势力伸展到黄河下游。《史记》载平乱后，“遂诛管叔，杀武庚，放蔡叔，收殷余民，封康叔于卫，封微子于宋，以续殷祀。”《逸周书·作雒解》记：“周公立，相天子，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反……二年作师旅，临之攻殷。殷大震溃，降辟三叔……凡所征熊盈十有七国，俘维九邑，俘殷献臣。”可知东征以后，扩大了鲁地的统辖范围。给鲁国统治者带来很大好处。当然，周公东征是一场残酷的战争，广大从征军士倍受其苦。《诗经·豳风·东山》曾记周公东征事：

“我徂东山，慆慆不归。我来自东，零雨其霏。我东归兮，我心西悲。制彼裳衣，勿士行枚。蜎蜎者蠋，烝在桑野。敦彼独宿，亦在车下。……果臝之实，亦施于宇。伊威在室，蠨蛸在户，町疃鹿场，熠熠宵行。不可畏也，亦可怀也……”

从当时从征军士的情绪里可以看出战争之久，士气之消沉。为建立和巩固西周统治的东征，是建立在大量军士颠沛流离，死亡的基础上的。

周公三年东征，问题还未全部解决，《尚书·费誓》记：“鲁侯伯禽宅曲阜，徐夷并兴，东郭不开”，于是又有“成王东征淮夷”之举，前后又经十年左右的时间，“遂践奄”，即将故奄地全部平定下来。

周天子把东征看作一件大事，曾把下面献来的好东西（嘉禾）赐给东征军。东征中，很多殷人当了俘虏，被称作“民献”，“人献”或“顽民”，成为新统治者治下的种族奴隶。西周统治者正是由于认真对付殷人的叛乱，才有可能在短时期内建立起新的统治秩序，才能得以进一步发展正在上升的奴隶制。而这对鲁国统治者来说，却带来了直接的好处。

周公旦的另一个功绩就是“制礼作乐”，即制订了一套奴隶制的各种制度、政策，为发达的奴隶制国家绘制了蓝图，成为我国奴隶社会的一个政治家。

西 周 时 期

西周时的古鲁国，共五代九个国君，约200年。他们的继承关系是：

